

## “咸通十哲”新探

赵 敏

(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杭州 310018)

**摘 要:**“咸通十哲”以“十哲”为关键能指来反向建构并封存这一能指结构的意义,“十哲”具有丰富的互文性。“咸通十哲”整个能指结构链都缺乏相应的确定性和理据性,都与常规所指断裂,使得这一语符充满了反讽意义。“咸通十哲”不是一个诗派,缺乏成派的必要条件,《唐摭言》、《唐才子传》等文献资料也从未视其为诗派。“咸通十哲”自身诗歌的“个性”劣势不符合传统政治诗学观,加之符号资本缺乏,成就不高,因此在文学场域的各级占位中败下阵来,最终湮没于文学史。

**关键词:** 咸通十哲;能指结构;理据性;诗派;占位

**中图分类号:** I20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16) 05-0485-05 **引用页码:** 080402

“咸通十哲”是指晚唐懿宗咸通(860—873)和僖宗咸通(874)年间的一个文人群体,他们履历不详、仕途不畅、成就不高,很少引起研究者注意,因此现有的专门研究文章不超过10篇。当代研究者中以吴在庆先生用功最著,有《略论咸通十哲诗中的唐末社会》等5篇文章探讨“咸通十哲”的社会学意义;吴氏之外,藏清有《咸通十哲诗歌艺术论》等2篇专论“咸通十哲”诗歌风格的文章;另外像周勋初《“芳林十哲”考》、周蓉《唐末诗人的合成现象及其与科举制度的附生关系》等文章虽非专论,但亦有可资借鉴之处。上述论文史料充实,论证细致,但他们将“咸通十哲”视为一个诗派,这恐怕是有悖于事实的。本文名为“新探”,乃是希望运用符号学、场域研究等相对“新”的方法对“咸通十哲”的能指结构、理据性、群体性质、文学场域占位等问题进行梳理,以期呈现其相对原本的状态。

### 一、“咸通十哲”的能指结构

按照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观点,一个语言符号包括能指和所指两个部分,一个话语包括句段关系(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聚合关系)。以之来审视“咸通十哲”,把“咸通十哲”既

视作符号也视作话语,则其也体现为能指和所指结构,同时各有自己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

作为一个词组,“咸通十哲”由“咸通”和“十哲”两个词构成,两者构成一个定语加上中心语的偏正结构,表示时间的专有名词“咸通”对中心语“十哲”起限制和区别作用,由此来标明“十哲”的存在时间。我们知道,短语的整体小于各个语词之和,在语义指称的外延方面小于两个语词的简单相加,从而更为适切,具有了更多的排他性。“咸通”和“十哲”两个能指组合的背后实际上经历了聚合轴上进行选择的过程,在选择过程中它完成了对“咸通”和“十哲”的替代能指的各种可能性的排除,保证了其自身的独特性,使其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以便对应专一的指称关系。

“十哲”的能指结构形态与“咸通十哲”类似,只不过它是一个更为紧缩的结构,也用来对应专一的指称关系。“十哲”也是一个定中关系的偏正结构,数词“十”也是对于中心语“哲”进行限制和区别,一是标明“哲”的数量,一是区别于其他的“十二哲”或“八哲”;中心词“哲”也有标明和排他作用,它排除了语义学矩阵中“非哲”、“反哲”的可能性。

拉康认为:“从历时角度来说,展开一个句子,组

合成分或话语片段时,每一符号都修饰它之前的符号。由于关键能指在组合成分的关键结尾处,因此意义从反向建构并封存。”<sup>[1]</sup>故此,从意义的生成角度及其过程来看,“十哲”是关键能指,它修饰“咸通”这一能指。通过“十哲”这一关键能指从后向前的反向构建,“咸通十哲”的意义得以建立并被封存起来,具有了独一性。

同样的情形依然发生在“十哲”一词之中,“哲”作为关键能指反向封存并生成了“十哲”的意义。“十哲”一词的互文性非常明显,它最初可能源于佛教,晋代高僧支遁便有“玄韵乘十哲,颀颀傲四英”<sup>[2]</sup>之语,此“十哲”用来指涉维摩诘的十大弟子。唐代开始,文庙开始用“十哲”来配祀,今存文献可查到的关于“十哲”配祀孔子的记载可追溯到玄宗开元八年(720)。十一年后,武庙也采用了“以古名将十人为十哲配享”<sup>[3]</sup>的“十哲”模式。

## 二、“咸通十哲”的理据性

接下来讨论“咸通十哲”的理据性问题。前文已述,“咸通十哲”组合轴上的能指都经过了它在聚合轴上的选择过程,之所以最终完成“咸通”和“十哲”的组合轴和聚合轴的双轴选择,是因为这种选择有着理据性。

“咸通十哲”这一能指组合方式最早呈现是在明代《唐音癸签》的“咸通十哲”<sup>[4]</sup>条目之中,但其源头则在五代《唐摭言》“张乔”条中:“咸通末,京兆府解。李建州时为京兆参军,主试。同时有许棠及乔,与喻坦之、剧燕、任涛、吴罕、张蟾、周繇、郑谷、李栖远、温宪、李昌符谓之‘十哲’。其年府试《月中桂》诗,乔擅场。”<sup>[5]</sup>按此说法,“咸通十哲”中“咸通”一词的理据性在于其为“咸通末”的京兆府解等第,《唐摭言》这一说法为宋代的《诗话总龟》、《唐诗纪事》等著作所接受。不过我们对“咸通十一年等第”的说法要存一些疑问,因为《唐摭言》“张乔条”若是标点为“咸通末,京兆府解。李建州时为京兆参军,主试。同时有许棠及乔(与喻坦之、剧燕、任涛、吴罕、张蟾、周繇、郑谷、李栖远、温宪、李昌符谓之‘十哲’)。其年府试《月中桂》诗,乔擅场”的话,则“咸通十一年等第”并不成为“咸通十哲”中“咸通”的理据性。这并不是强词夺理,因为在这名单当中,李昌符“登咸通四年进士第”<sup>[6]</sup><sup>1043</sup>,可确定当年未参加京兆府的府试,这证明第二种标点方法也是有可能的。

《唐才子传》的相关说法也对“咸通十一年等第”这种理据性进行了颠覆。《唐才子传》“张乔”条说:

“时东南多才子,如许棠、喻坦之、剧燕、吴罕、任涛、周繇、张蟾、郑谷、李栖远,与乔亦称‘十哲’。”<sup>[7]</sup><sup>423</sup>此条删去了《唐摭言》和《唐诗纪事》中所列的温宪、李昌符两位,并且注明他们号称“咸通十哲”的理据性是“时东南多才子”。傅义先生以为:“惟《才子》(十)‘张乔传’所记最为准确,此传首云:‘时东南多才子。’下列许棠等十人,无温宪、李昌符,因宪为北人,昌符先已及第。”<sup>[8]</sup>然而《唐才子传》“张乔”条的名单中,剧燕是山西蒲坂人,张蟾是山东清河人,都是“北人”,不能算作东南才子,因此傅先生的解释也是不成立的。《唐才子传》“郑谷”条又说:“(谷)与许棠、任涛、张蟾、李栖远、张乔、喻坦之、周繇、温宪、李昌符唱答往还,号‘芳林十哲’。”<sup>[7]</sup><sup>399</sup><sup>①</sup>这次删去的是剧燕、吴罕二人,并且认为他们号称“咸通十哲”的理据性是因为彼此“唱答往还”。

这样,为什么是“咸通”,便有了三种理据:咸通十一年京兆府等第,“时东南多才子”,“唱答往还”。究竟哪一种准确,哪一种是“咸通”的理据性,着实让人犹疑!

由此又引出“十”的理据性的问题。我们看到,《唐才子传》的“张乔”条和“郑谷”条虽然记载“咸通十哲”的名单有所出入,但两次“十哲”都是10人。因此,在《唐才子传》中,“咸通十哲”之“十”的所指就是10。但上引《唐摭言》在“咸通十哲”条中竟然列出了12人,“十”的所指居然是12。《唐诗纪事》“张乔”条更是说:“乔,池州人,有诗名。咸通中与许棠、喻坦之、剧燕、任涛、吴罕、张蟾、周繇、郑谷、李栖远、温宪、李昌符谓之‘十哲’,十哲而十二人。”<sup>[6]</sup><sup>1038</sup>这样,“咸通十哲”之“十”的所指问题,就出现了两种意见:《唐摭言》、《唐诗纪事》认为“十”的所指实际上是“12”,“十”仅仅是一个数词的泛指而已,并不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10的心理概念等同;《唐才子传》则认为“十”的所指即是10,前引傅义先生应该也是持这种意见。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样很难判断孰是孰非。从时间上说,《唐摭言》的作者是五代的王定保,《唐诗纪事》的作者是北宋的计敏夫,均早于《唐才子传》的作者元代的辛文房。若是离唐代更近的王定保、计敏夫们不介意“十”与“10”的对等关系的话,是否确有其社会语言学上的道理?我们知道,古汉语中

① 按此处“芳林十哲”显系“咸通十哲”之误,因为《唐摭言》(卷九)、《唐语林》(卷四)等书的相关条目已经证明那是咸通间交通宦官的秦韬玉等另外一个诗人,兹不赘述此问题。

有“如是者三”、“九泉”这样的用法,其中“三”“九”是虚指,那么是否有可能“十”也用来虚指,李白就说“金樽清酒斗十千”,王昌龄说“旌旗十万宿长杨”,韦应物说“流水十年间”,可见“十”并不一定非要与10相对应不可。

“哲”也出现了理据性滑落的情况。许慎云:“哲,智也。”<sup>[9]</sup>可知“哲”是用来指智者的。前引诸条目中,佛教也好、文庙也好、武庙也好,配祀的“十哲”都声名卓著、有着崇高的声誉和文化地位,完全能够配得上“哲”的称号。即便到了唐肃宗欲封太公望时诏“有司依文宣王置庙,仍委中书门下,择古今名将,同文宣王置亚圣及十哲等享祭之典。”<sup>[10]</sup>将当时的“今名将”入选“十哲”时,虽较之“古名将”的时间距离被压缩,有了一定的风险,但这个“今名将”依然符合“智者”的“哲”的概念,因为“名将”的“名”就是这“哲”的有力保证。但在百年之后的咸通年间,突然出现了两个理据性滑落的“十哲”群体:“芳林十哲”和“咸通十哲”。这些“哲”都是当时的举子,没有时间距离作为“哲”的保证,更糟的是他们在人品、学识、履历等方面也都还没有保证。“芳林十哲”是一个彻底的“否定性”组合,“芳林”是“芳林门”的简称,“芳林门”系宦官出入之门,“十哲”奔走于为士人所不齿的宦官阉党以求功名富贵,远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了。“咸通十哲”虽然人品上不像“芳林十哲”那样卑劣,但也声名不著、功名未立、仕途未开、诗材狭小,与传统意义上的“哲”相距甚远。因此,有理由相信,咸通年间,“哲”已经失去了其传统的理据性,被时代所“祛魅”,被扁平化成了一种没有文化内涵要求的普遍性称谓,已经是凡人皆可为“哲”了,其形势大约正如今日动辄称人为“女神”“男神”相似。

### 三、“咸通十哲”非诗派

这样看来,“咸通十哲”这一话语在各个能指位置上都发生了所指理据性滑落的问题,符号链上的每个能指部分都和其所指部分都发生了断裂,成为了“漂浮的能指”。这让我们想起一个词——反讽,无处不在的割裂与否定构成了强烈地反讽,致使“咸通十哲”这一短语呈现出离散效果,符号链上的每一个能指都召唤着更为复杂的意指关系,从而有了更为深刻的内涵,这种内涵的深化是通过对其外延的背叛来获得的。

因此,“咸通十哲”并不能简单按其字面意义理解为“咸通时期的十位著名诗人”。他们其实也不是一个诗派,将其当成一个诗派是当下“咸通十哲”研

究中有一个误区。藏清先生有《咸通十哲诗歌艺术论》、《论唐末诗派的形成及其特征——以咸通十哲为例》两篇论“咸通十哲”的诗派艺术的文章;吴在庆先生的文章主要讨论“咸通十哲”的社会学意义,他小心翼翼,但依然认为:“十哲身处晚唐多事之秋,身世多艰,以此诸人诗中多有山河颓败,村落荒鞠凋残之句;也颇有伤离怨乱,叹穷嗟卑之篇。故大存晚季萧索忧愁之色。而诸人又多有推崇雅正诗风者,为诗尚苦吟清切,耻为浮艳之什等。因此在诗歌中或多或少呈现出受大历十才子、姚合以至贾岛诗风影响之迹。表现出不少共同或相近的特色。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十哲的紧密内在联系,完全有理由将十哲作为一个文学群体来研究。”<sup>[11]</sup>按吴先生所列的“十哲”成派的理由可以简省为二:晚唐之气,姚贾影响。这两条理由在晚唐的大部分诗家中应该是都可以成立的,故放到“十哲”这里资其立派怕是有些牵强。

藏清先生实际上也意识到了“十哲”不能成派的问题,他说:“‘咸通十哲’都是出身寒微应举多年的下层文人,共同的社会地位,相近的生活遭遇使他们感情相投,诗歌往还唱和,形成了有些接近的诗歌风格,被时人划分为一个文人团体。但这个团体是极其松散的,其称谓产生的不严肃导致了它作为诗歌派别的不严格。”<sup>[12]</sup>虽然藏清先生随后又将“十哲”作为一个诗派进行分析的做法让人狐疑,但这段话的后面两句其实还是颇有见地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许多“诗派”都存在着“称谓产生的不严肃”问题,如“大历十才子”、“江西诗派”、“江湖诗派”等等,由此导致了一连串理不清的问题。

上文已说过,“咸通十哲”的解释有《唐摭言》和《唐才子传》两个系统。按《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的《唐摭言》来理解,“咸通十哲”当是京兆府的十二位等第,于情于理断无在一次科举中将一个诗派全部当作等第选送之理。即便是李频作为主考官,在挑选诗歌上有自己的爱好,似乎也不可能,这种情形在历朝历代历次历级放榜中都没有见过。所以如果“咸通十哲”得名于《唐摭言》所述的情况,则“咸通十哲”不应算作一个诗派。如果如《唐才子传》“张乔”条所言,“咸通十哲”之得名是因为“时东南多才子”,则此十人是因为其地域关系,同样也不构成其作为一个诗派的理由;如果如《唐才子传》“郑谷”条所言,则十人之间是“唱答往还”的关系,则构成一个诗派的理由最强。不过还应该注意,《唐摭言》、《唐诗纪事》、《唐才子传》、《唐音癸签》等书从未将其视作



为一个诗派。而且现存“咸通十哲”的诗歌之中,剧燕、任涛、吴罕、李栖远四人的诗作基本湮没无存,无从对证;其余8人诗作风格上还是有区别的,张乔、许棠、俞坦之学姚贾最多,像郑谷、李昌符、张蠙、周繇、温宪作诗都有自己的特点,并不专学姚贾,可见他们并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诗学理想和诗学主张;此外,“咸通十哲”没有一个类似于诗派领袖的人物,而诗学主张和诗派领袖是一个诗派的成立必要条件。

#### 四、“咸通十哲”的占位

“咸通十哲”受到的关注不多、评价不高,大约都是“咸通十哲,概乏风骨”<sup>[13]</sup>之类。之所以被认为“概乏风骨”,除了诗歌本身的问题之外,大约还有许多文学社会方面的因素。套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的说法,是关涉到文学场的占位问题,这问题又可以从场域、习性、资本三个角度来切入。

首先是“咸通十哲”诗歌本身的“习性”问题。“咸通十哲”的诗歌本身并没有太多的超出晚唐时人的特质。晚唐诗家有于社会状况和时代风气,往往力避宏大叙事,有意弱化现实,而咏叹、关怀一些琐碎、渺小之中的真实感、存在感。这种偏重私人话语的诗歌书写方式在以服务政治、服务社会为宗旨的传统诗论中一向被排斥。虽然“咸通十哲”也有一些忧国忧民的篇章,风格也并非一味柔弱。

从场域来说,“咸通十哲”首先属于唐代诗人这一场域,唐代的诗人灿若繁星,名家辈出,“十哲”在其间微不足道,不值一提;他们在唐代又属于晚唐场域,晚唐诗一向受着后人的藐视,“近世诗人好为晚唐体,不知唐祚至此,气脉浸微,士生斯时,无他事业,精神伎俩,悉见于诗。局促于一题,拘挛于律切,风容色泽,清浅纤微,无复浑涵气象。求如中叶之全盛,李、杜、元、白之瑰奇,长章大篇之雄伟,或歌或行之豪放,则无此力量矣。故体成而唐祚亦尽,盖文章之正气竭矣。”<sup>[14]</sup>就这两点来说,“咸通十哲”的不受待见并非偶然。

即便在“晚唐”这一场域内部,“十哲”也缺乏相应的“符号资本”。首先,“咸通十哲”没有政治资本,基本上都是家世清贫,久困场屋,十二人之中,最终进士及第的仅许棠、郑谷、李昌符、张蠙、周繇、温宪6人,其中许棠前后应举30年,郑谷前后应举16年,张蠙至少应举25年,温宪至少应举19年,李昌符至少应举10年;他们仕途也不顺,李昌符最高官职是膳部员外郎、许棠是江宁丞、周繇是检校御史中

丞、张蠙是膳部员外郎、郑谷是都官郎中、温宪是山南从事,其余六人不详,因未中第,想来应该是布衣居多。其次,他们也没有太多文化资本,在文学场得到的关注极少。靠“咸通十哲”成名之时,他们的“赞助人”是李频,李频自身在当时的文坛也没太多话语权(后来在文学史上也没有名气),故而“十哲”也不太可能受到当时文学场的重视;以“咸通十哲”成名之后,他们因没有特色、没有故事、不符合主流政治诗学观被人漠视,也很少有诗文评类的文献谈及(只有郑谷因与齐己“一字师”之事、温宪因父亲为温庭筠之事为人提及)。第三,他们不是一个诗派,因而没有群体优势,只能一个个地单列出来和皮日休、陆龟蒙、司空图、罗隐、韩偓、吴融们竞争,因此轻易地被击败、被边缘化,最终在“晚唐”场域内部,占据不到任何优势。

#### 五、结语

“咸通十哲”这一文学现象充满了复杂性,也有着一定的代表性。在能指结构上,它依靠互文性意味极浓的“十哲”一词作为关键能指来封存这一定语加中心词的能指结构的意义,但正是“十哲”的丰富的互文性导致了其理据性的滑落。非但如此,“咸通十哲”整个能指结构都缺乏相应的确定性和理据性,这种能指和所指的断裂使得“咸通十哲”充满了反讽的意义,这也为其成为的批评对象埋下了伏笔。而当下的研究者将“咸通十哲”当作一个诗派来研究的局面显然是有悖于《唐摭言》、《唐才子传》等文献资料对这一能指结构组合过程的讲述,正因为不是诗派,“咸通十哲”没有群体优势,自身“个性”的劣势和符号资本的缺乏等问题使其在文学场域的占位搏杀中败下阵来,最终湮没于文学史,鲜有人忆及。

#### 参考文献:

- [1] 保罗·科布利,莉莎·詹茨. 视读符号学[M]. 许磊,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7:85.
- [2] 严可均. 全上古三秦汉三国六朝文[G].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1653.
- [3] 欧阳修.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377.
- [4] 胡震亨. 唐音癸签[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288.
- [5] 王定保. 唐摭言[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44.
- [6] 计有功. 唐诗纪事[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7] 辛文房. 唐才子传[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 [8] 傅义. 郑谷诗集编年校注[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 社,1993:260.
- [9] 许慎.说文解字注[M].段玉裁,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57.
- [10]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20.
- [11] 吴在庆.咸通十哲三论[J].中州学刊,1992(6):98-103.
- [12] 藏清.论唐末诗派的形成及其特征:以咸通十哲为例[J].文学评论,1997(5):77-78.
- [13] 翁方纲.石洲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5:32.
- [14] 俞文豹.吹剑录全编[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32.

## New Exploration of the Ten Poets in Xiantong Era

ZHAO Min

(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Ten Poets (TP) as the key signifier is used to reversely construct and preserve the meaning of the term of The Ten Poets of Xiantong Era (TPXE). TP has a wealth of intersexuality. The whole signifier structure chain of TPXE lacks corresponding certainty and motivation and the signifier is broken so that the term of TPXE is full of irony. TPXE is not a poetry school, for it lacks some necessary conditions. Thus, some books such as Tang Chih-yen and Biography of Tang Cai-zi also never regard it as a poetry school. The individuality of TPXE does not accord with the political ideas of poetics. They also lack symbolic capital and achievements, so they failed in the placeholder competition in the literary field and were forsaken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Key words:** Ten poets in Xiantong era; signifier structure; motivation; poetry school; placeholder

(责任编辑:任中峰)